

# 论草原文化的发展及变迁<sup>\*</sup>

## ——基于突厥生态文明的发展及变迁研究

● 崔世俊<sup>1</sup>, 盖志毅<sup>2</sup>, 张振华<sup>1</sup>

(1. 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2.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9)

**摘要:**一个民族的生存以及生活方式与他周边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相互作用的, 古代北方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对生活在这里的突厥民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突厥族以及与畜牧相关的生态文明意识; 同时突厥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对这种自然地理条件的适应——突厥人的生态文明意识又保护了这片草原环境。

**关键词:**草原文化; 突厥族; 生态文明

DOI:10.3969/j.issn.1009-4458.2012.03.076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12)03-0188-03

突厥民族兴起于公元六世纪中叶, 属于铁勒族系, 其祖先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称为丁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敕勒, 到了隋时统称铁勒, 分布在大漠南北, 东起贝加尔湖, 西至中亚的辽阔地域, 分四十一个部, 突厥为其中之一。在公元五世纪中叶, 突厥人成为柔然的奴隶, 被迫迁居金山(今阿尔泰山)的南麓, 以锻铁生产为柔然奴隶主服务, 柔然称他们为“锻奴”。金山的形状像兜鍪(都谋), 即防御兵刃的盔帽, 当时的习俗称兜鍪为“突厥”, 突厥人以此号为号。<sup>[1]</sup>552年突厥打败柔然, 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 势力迅速扩展至蒙古高原。其文化及风俗习惯, 如制造高轮木车、东向拜日、崇拜萨满巫师等, 对契丹、蒙古多有影响。

### 一、突厥族生态文明的意识表现——自然崇拜

#### 1. 族源与图腾

狼这种动物, 外貌丑陋, 生性贪婪、凶残。奇怪的是, 在某些古代民族的传说中, 狼却被描述成热心抚育人类幼儿的善良动物, 甚至被视作他们的祖先而加以顶礼膜拜。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就是一例。

在突厥初世史的传说中, 几乎都与“狼”有关。《隋书·突厥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其先国于西海之土, 为邻国所灭, 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 不忍杀, 刖足断臂, 弃于大泽中, 有一牝狼, 每啣肉至其所, 此儿囚食之, 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 苏良有孕焉。彼邻国者, 复令人杀此儿, 而狼在其侧, 使者将杀之, 其狼若为神所凭, 欻然至于海东, 止于山上, 其山在高昌西北, 下有洞穴, 狼入其中, 过得平壤茂草, 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 其一性阿史那氏, 最贤, 遂为君长。”在《北史》《周书》的突厥本传所记述的另一个传说中, 同样认为出于索国的突厥人的始祖父伊质泥师都也是由狼所生:“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 在匈奴之北。

其部落大人曰阿谤青, 兄弟十七人, 其一日伊质泥师都, 狼狼所生也。”这两部书的作者还强调指出, 以上两个传说虽有差异, 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即突厥人“终狼种也。”竖立在突厥人墓地前的石碑中雕刻的图案十分生动的反映着突厥人是由“牝狼”繁衍而成的传说。据考证于1956,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哈努依平原上, 发现了一个有母狼的石碑。由于母狼腹部下面的人体形状很奇特并且清楚, 人们都认为是突厥时期留下的遗物, 为了纪念阿史那王族成员。从浮雕图案可见, 狼作为突厥人的祖先并且作为民族的“图腾”而崇拜是有所追溯的。<sup>[2]</sup>《通典》云:“旗幟之上, 施全狼头。侍卫之士, 谓之附离, 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 志不忘旧。”由此可知, 狼在古突厥人的心目中, 其言语向背和出没去留, 与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都是密切相关的。



图1<sup>[3]</sup>

明代王沂著《稗史汇编》曾记载:“一种名突厥, 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与金角白鹿交感而生。”从上述图腾传说来看, 突厥以狼为母系之始祖, 以鹿为父系之始祖。<sup>[4]</sup>突厥人也爱鹿, 《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突

\* 收稿日期:2012-03-11

基金项目:内蒙古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农村牧区发展研究所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明”的阶段成果, 项目编号:20006.299.039。

作者简介:崔世俊(1986—), 女, 山西朔县人,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农牧业政策与理论。

厥可汗严禁猎鹿,故其境内“群鹿训钾于人,不甚惊走”。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族,他们日常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狼、牛、马、羊等动物,这种对动物依赖的生存方式使得这个古老的民族即畏惧它们,又不得不依赖它们。进而,这种图腾崇拜所反映出的生态文明意念也是不言而喻的。

## 2. 天神崇拜

《周书·宇文测传》载:“(突厥)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隋书·突厥传上》:出征时,以月的圆缺为主判断,“候月将满,辄为寇钞”。《隋书·突厥传下》:突厥汗国分裂后,西突厥也还“岁遣重臣向其失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突厥人祭祀神灵时,“天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sup>[5]</sup>具有特点的祭祀方式是为了适应突厥人生活没有固定场所的游牧形式而产生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有些蒙古人中看到这样以毡形和祀竿为崇拜对象的传统风俗。<sup>[6]</sup>

## 3. 自然崇拜

突厥人在看待自然现象时,譬如电闪雷鸣等,他们认为是变化莫测的,是上天施法的结果。崇拜中又带有恐惧,所以受到的限制比较大。就连突厥汗国强盛时期突厥族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木杆可汗公公俟斤,也“不愧鬼神”。《资治通鉴》卷169。史载,俟斤自恃其强,在欲毁婚约于北周时,“会大雷风起,飘坏其穹庐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惧,以为天谴,乃备礼送后”。《周书》卷九《武帝阿史那皇后传》<sup>[7]</sup>

## 4. 尚东拜日

古代的突厥人对太阳有着至高的崇拜,突厥首领登位大典中就有关于崇拜太阳的内容,《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记载:“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与拜日相关联,突厥人还尚东,以东方为贵。据《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可汗“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载:“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则正是突厥人拜日尚东习俗在居住特征上的具体反映。几十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百十多个石头雕刻而成的塑像,特别是在新疆的阿勒泰、伊利、博尔塔拉等地方,这些雕像大部分是发现在墓葬的旁边。一些国内外的学者也都认为它主要还是隋唐时代有关突厥汉国的遗产。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些石人和葬墓就很容易发现突厥人崇尚东方的习俗可以在墓葬形制上找到答案。比如说长方形的墓墙是用石块围成的并且是东西走向,石雕的大部分是朝向东方,处于墓墙的东边。这也就证明了突厥人的尚东习俗。<sup>[8]</sup>

突厥的君主都是以东面作为自己居住的地方,可汗的长子、长帝出任一些重要的职位。摄图、处罗侯等大可汗也都是以小可汗的身份以东面来作为自己居住的地方来继承传统。值得肯定的是,在对太阳的崇拜中可以看到以东方为贵的习俗。<sup>[9]</sup>但是突厥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一直在游牧生活中,并没有去积极地改造自然,仅仅是适应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一旦遇到暴风雪的来临,旱灾蝗灾的发生,没有抗拒自然灾害能力就要面对人员和牲畜的大量死亡。例如隋文帝诏书中在谈到沙钵略可汗执政之际的情况时曾这样讲到:突厥“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暑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遂派兵出塞攻击突厥,使之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游牧经济在蒙古高原存在的必然性。因为,这种自然灾害也是对脆弱的蒙古高原生态系统调节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看待游牧经济生产方式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农耕本位”和“中原本位”的思想方法。事实上,在蒙古高原,游牧业是唯一能够可持续的经济形式,自从近现代摒弃了游牧业,蒙古高原的草原生态环境就迅速的恶化了。

## 5. 事火崇拜

迄今所见,关于古突厥人崇拜火的文字记载甚为寥寥。其一是东

罗马史家席摩喀塔的记述:“突厥拜火,亦敬空气水土,然仅奉天地之唯一造化主为神,以马牛羊祀之,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其二见于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玄奘)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床,敷蓐请坐。”这是两条直接声称突厥“事火”或“敬火”的记载。其三,《酉阳杂俎》前集卷四云:“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这条史料虽未言“事火”,但是“事祆”与“事火”可视为同一。其四,据六世纪末东罗马史家弥南的记载《Menandri Protecra Fragmenta》,东罗马(拜占庭)使臣蔡马库斯在前赴突厥可汗室点密(Diz-abulus)驻地的途中,经过“粟特人的地区”。当时一群前来迎接的突厥人为他(们)举行“祛邪”的仪式,即摇铃击鼓,手持香火环绕使团的行李奔走。此后又令蔡马库斯本人也从火堆中走过,以作“净化”仪式。伙里虽未提及突厥“敬火”,但总是在一种类似宗教仪式的情况下使用了火,所以也列于此。由于火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所以几乎所有民族都对火怀有过或多或少的敬畏感。即使在拥有高度文明的定居人中间,也存在着对火的种种崇拜和禁忌。<sup>[11]</sup>

## 6. 树木崇拜

突厥人也有着树木崇拜的观念,《周书》卷50《突厥传》“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大树”成为突厥人择主立君的最高审判者,它是具有“神判”性质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反映出突厥人和其他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所共有的树神——生命之神、权力之神的崇拜观念。<sup>[12]</sup>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祖先和大自然抑或是动植物曾有过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保护大自然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从事游牧经济的突厥族往往生活在气候干旱少雨的草原地带,水、草、牲畜使他们赖以生存的前提。狼、鹿、树木、太阳等等,这些被看作与其祖源有着密切关系的大自然之物同时也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保护神,人们对其敬畏、祭祀等,以求其保护。

# 二、突厥族生态文明的行为表现——生产生活

## 1. 生产、生活方式

游牧生活一向都是“逐水草而居”“轮牧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当然这样的方式对于生态平衡是很有好处的。牧民们在一定的草场内自然形成,依照季节和牧场好坏,循环的,组织化和规律化得放牧的形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草场的过度使用和牧草的再次生长,更好的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sup>[13]</sup>尽管如此,游牧经济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上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比如,隋文帝对付突厥时,就利用了突厥领地内的自然灾害。《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记载:隋文帝曾认为突厥“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公元582年)四时,竟无雨雪,川枯黄暴,卉木烧尽,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暑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遂派兵出塞攻击突厥,使之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游牧经济在蒙古高原存在的必然性。因为,这种自然灾害也是对脆弱的蒙古高原生态系统调节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看待游牧经济生产方式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农耕本位”和“中原本位”的思想方法。事实上,在蒙古高原,游牧业是唯一能够可持续的经济形式,自从近现代摒弃了游牧业,蒙古高原的草原生态环境就迅速的恶化了。

狩猎业在突厥人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后突厥怛伽可汗的大臣曾说过:“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即唐朝)百分之一,所以

能与之而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之故。<sup>[14]</sup>

《隋书·突厥传》记载他们过着“随水草迁徙,以毡帐为居室……”的生活。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突厥人,其居住与匈奴、乌桓、鲜卑各族相同,是设在地面上的圆屋顶天幕式毛毡“穹庐”即“毡帐”。因游牧等原因需移居时,就把这些穹庐毡帐折叠起来,与家具一起装到车辆上运走。有时还在设有顶棚的车中生活,这种居住方式的毡帐面积一般都不是很大,而且随水草迁徙。显然这种居住方式反映了当时古代少数民族人民没有强烈的物质追求的欲望,有安身之所,果腹之食即可,从而与现代人无尽物质追求欲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2. 突厥居住地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公元600—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温暖期,隋唐五代以及突厥民族就处在这一温暖期中。这一时期也是气候湿润时期。科学工作者研究了中原地区近万年来的降水量,结论是最湿润多雨期为公元630—800年。从竹园在黄河流域的分布来看,北方气候应该还是比较湿润的。气候的好转和蒙古草原的恢复,为北方少数民族提供了活动舞台。

突厥人早年生活在叶尼塞河流域上游地区,为高山针叶林分布地带。《新唐书》卷217下,《黠戛斯传》曾记载:“其兽有野马、骨咄、黄羊、羴羴、鹿、黑尾,黑尾者似獐,尾大而黑。鱼,有蔑者长七八尺,莫痕者无骨,口出颐下。鸟,雁、鹭、乌鹄、鹰、隼。木,松、桦、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颠,而桦尤多。”《周书·史宁传》载: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时突厥木杆可汗假道凉州,将袭吐浑,太祖令(史)宁率骑随之。……破之,俘斩万计,获杂畜数万头。……宁还年干青海,与木杆会,木杆握宁手,叹其勇决,并遗所乘良马,令宁于帐前乘之,木杆亲自步送。突厥以宁所图必破,皆畏惮之,……木杆又遣宁奴婢一百口,马五百匹,羊一万口。”无论是这里富饶的森林资源亦或是这里得天独厚的牧草资源,都是当时生态良好的见证。

突厥人主要从事畜牧业,《隋书·突厥传》记载他们过着“随水草迁徙,以毡帐为居室,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披发左衽,善于骑射的游牧生活。”其生活习惯,大体上与匈奴相同。其畜牧业规模之大也足见突厥所居之地生态环境之优良。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启民可汗自言:突厥人的羊、马,“遍满山谷”。<sup>[15]</sup>

## 三、突厥族生态文明的消失

### 1. 农耕文化北迁加速了农耕化的进程

随着隋唐对突厥战争的节节胜利,隋唐加速了在突厥居住地农耕化的进程。除了传统的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供养和税粮的形式影响农耕生产以外,还有就是隋唐军队开发疆域分散到边地的农耕生产。战争不但改变了人口结构,也改变了各个地方农牧经济的分配,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变对于原本是放牧的草原来讲影响很大。土壤被侵蚀导致的土质疏松等一些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因此某些地方的植被需要保护。唐后期仍鼓励耕垦而且陂泽山原和边地水草丰美之处是重要的垦辟对象,这会使农田生态系统进一步扩大,自然植被等进一步减少,对生态环境也有相当大的危害及影响。<sup>[16]</sup>

### 2. 突厥南迁中原受到农业经济的影响

东突厥汗国灭亡前后,大部分突厥人南迁,在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农业生产日益受到重视。唐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思结部落“便移就代州,即令(张俭)校代州都督。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采,拟充贮备,蕃人喜悦。”《旧唐书》卷83《张俭传》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欲遣突厥返归河北,册封阿史那思摩为可汗,诏曰:“久欲存其亡国,返其遗萌,尚恐疮痍未瘳,衣食不足。今岁已积,年谷屡登,众

种增多,畜牧繁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默啜可汗为了发展农业,曾向唐朝所要农具、种子等,《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载:“初,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则天初不许,默啜大怨怒,言辞甚慢,拘我使人司宾卿田归道,将害之。时朝廷惧其兵势,纳言姚璹、鸾台侍郎杨再思建议请许其和亲,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顷、农器三千事以与之,默啜浸强由此也。”后突厥汗国末期,与唐军交战,《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王破契丹露布》记载:曾焚毁其“车帐农具器械储粮,……不知涯极。”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sup>[17]</sup>

### 3. 传统居住方式的变迁

关于突厥族的传统居住方式,《隋书·突厥传》记载:“随水草迁徙,以毡帐为居室。”从突厥族传统的居住方式亦能看出,其居住方式是一种适应草原生态经济的模式,从点滴生活以及文化习俗中都渗透出了突厥族的生态意识。不难想象怎样的生态环境造就怎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特点,使这个古老的突厥民族能够始终保持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

但是,随着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大批突厥人向南迁徙,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生活日益安定,传统居住方式逐渐向定居形式转变。据考证,后突厥汗国的开国之主颉跌利施可汗在黄河以北喀喇库木建了一处城郭。其子毗伽可汗则定居在建有寺庙道观的城中。《太平寰宇记》曾记载:突厥牧地“浆涂垒汗城东北有小城,一名可贺郭城。麻弹城、杨义城、马矢城、瓜城、矢波罗城、达罗城、燕木城、达督城、屈律城,此诸城傍有美水草,皆前代突厥移徙不常处”。如此之多的城池在突厥境内出现,意味着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突厥民众已经转为定居的形式。但是突厥人向往游牧生活的倾向并没有随着经济方式的转变而全部都消失,部分突厥人仍然顽固的抵制着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载:“小杀又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敕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又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所并。且寺观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争强之道,不可置也。’小杀等深然其策。”但是由于诸多客观原因的影响,这些抵抗势力也仅仅存在了不久就不得不被镇压,最后仅仅一小部分突厥人又逃到了于都令山附近一带,过起了传统的游牧生活。<sup>[18]</sup>

## 参考文献:

- [1] 乌兰托娅,孔群. 突厥——隋唐时期活跃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J]. 内蒙古画报, 2004(5).
- [2] 吴景山. 突厥人的图腾崇拜[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4(3).
- [3] 突厥——狼族传说[J]. 当代学生, 2005(24).
- [4] 苏鲁格. 蒙古. 突厥之图腾崇拜再探讨——“蒙古先民以狼为图腾”说质疑[J]. 蒙古学信息, 1995(4).
- [5] 西阳杂俎(前集卷之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5.
- [6] [7] 杨维军. 突厥族的宗教信仰刍议[J]. 丝绸之路, 1999(1).
- [8] [9] [10] 吴疆. 突厥尚东拜日习俗考述[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4).
- [11] 芮传明. 关于古突厥人的敬天与事火[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1).
- [12] [17] [18] 张碧波, 董国尧.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白兴发.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7).
- [14] 张春怀. 草原上的游牧部族——突厥人[J]. 草原税务, 1995(6).
- [15] 林幹. 突厥族[J]. 历史教学, 1981(2).
- [16] 张全明, 王玉德, 等. 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